



伯驾与中国的开放

[美] 爱德华·V. 吉利克 (Edward V. Gulick) 著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丛书主编 周振鹤
译者 董少新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 爱德华·V. 吉利克
(Edward V. Gulick) 著



伯驾与中国的开放

董少新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by Edward V. Gulick

Copyright © 1973 by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6-03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伯驾与中国的开放 / (美) 吉利克 (Gulick, E. V.) 著;

董少新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9

(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 / 周振鹤主编)

ISBN 978-7-5633-7745-9

I. 伯… II. ①吉…②董… III. ①伯驾, P. (1804~1888) 一生平事迹②对外开放—历史—中国—清后期

IV. K837.127 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140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20 mm × 960 mm 1/16

印张: 21.5 字数: 289 千字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5 000 册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序

周振鹤

中国自晚明到晚清,大致完成了从“中国的世界”到“世界的中国”的观念的转变。晚明以前,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表示世界观念的是“天下”这个概念,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就是中国加上四夷的天下。这样思考问题似乎是有其合理原因的,自先秦到晚明,中国就一直都被视为天下的中心,在陆上有参天可汗之道,从海上则是万国梯航来朝。中国文化的影响既深且远,按照晚明人的算法,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至少有五十多个,所谓“声教广被,无远弗届”是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其周围的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平等外交的意识,有的只是藩属朝贡的概念。但16世纪末,情况开始有了变化。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带来了先进的世界地图。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注意到,声教所被的周边国家与中国合在一起,也只不过占世界的五分之一而已,还有更多的国家处在“化外之地”里。原来中国只不过是万国之一的知识开始出现,也就是说,在少数人中间,世界的概念已经开始代替了天下的意识。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明这还只是部分知识分子的觉悟而已。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有世界地图这回事,而对于统治者而言,则是不愿意正视

这一事实。其实清朝前期天主教传教士在宫廷中绘制过几种世界地图,但这并没有动摇皇帝的天下意识。1793年来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要求的是平等而不是朝贡式的外贸关系,但装载使团进献给皇帝的礼物的车子上,依然被插上了写有进贡字样的旗子。乾隆皇帝不但认为天朝大国无所不有,毋庸与远在九万里之外的蕞尔小夷互通有无,而且仍以天下共主的意识,要求使团人员行不平等的三跪九叩礼。乾隆是看过世界地图的,但心理上依然不放弃“中国的世界”的观念。但不过半个世纪,他的孙辈就不得不面对从“中国的世界”到“世界的中国”的痛苦的、真正的转变。列强要求中国建立近代化的外交制度,而不是将他们当朝贡国看待。他们要求在京派驻外交官,以平等礼节觐见皇帝,也就是建立近代化的外交关系。但是很不幸,这些要求都是在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所以中西及后来中日的外交关系,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对于这一时期的外交史的研究,自然是晚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外交史舞台上主要演员的外交官又当然是外交史的重要研究对象,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晚清外交史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而其中对驻华外交官的研究更几乎是一个空白的领域。

正当传教士研究近些年来已经进入我们的视野中时,我们对最早来华的三类洋人之中的外交官与商人实际上并没有开展多少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个案方面。例如,19世纪后期先后担任过驻华与驻日外交官的巴夏礼,其传记的下半部写的是驻日生涯,在日本早就被翻译了出来。而在中国可以说很少有人知道这部传记的存在,更不知道其上半部主要写的是巴夏礼的在华经历。《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的目的就是想对晚清外交史的研究贡献一些基本的文献资料。法国史学家朗格鲁瓦(C. V. Langlois)和塞格诺博(Charles Seignobos)说过:“历史学家与文献一道工作……不存在文献的替代物: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这套丛书就是从这一宗旨出发而提供给读者的一批基本文献,让读者看到晚清的外交史的部分图景。当然,传记并非原始资料,而是传记作者的研究成果。但是在不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一般读者看来,它仍然可以作为研究传主生平的津梁,只要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不被其结论所制约,而只着重其对事实的铺陈。当然事实也可以粉饰,更可以歪曲,但如果我们能不止于阅读一种传记,而是在

阅读传记的同时参考更多的历史资料,粉饰与歪曲是可以被我们看穿的。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比较的阅读法。因此,这样的文献是必须进行批判性的阅读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的,这一点相信任何读者都是心中有数。

历史作为消逝了的过去,并不是今天人们直接面对的事实,它只能在人们的重新认识与诠释中再现,所以历史本体自身必然带有诠释性,本体意义上的历史事实不可能完全重现——这当然指的主要是人类史而不是自然史,人们几乎无法原封不动地将其复原。如果说历史上的典章制度的复原还有一定的客观性的话,对于人物生平活动的复原就更多地带有历史编纂家的主观意识。因此,通常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事实,只能是经过历史认识主体重新建构的历史。也因此,我们并不担心这套丛书原作者所构筑的历史就会直接成为读者心中的历史,而相信读者心中的历史必定是远比传主所复原的更加完善的历史。

因此,收入本丛书中的传记对传主的某些不合适的赞许——这恐怕是所有传记作者写作的基本目的,并不代表此丛书策划者以及译者的观点,更不是策划者有意的导向,我想,在这个读者有独立阅读与判断水平的年代,如果以为策划者与译者有导向的能力,那会是对读者的一种不敬。这套传记的出版除了给读者提供一种文献的来源以外,还希望读者借着这一文献进而检索该传记所依据的更为原始的史料,同时还发现其他的史料作为补充或者修正,以彻底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举例而言,本丛书中的美国外交官伯驾传,除了这本传记外,在中国人的记述里,还有其他的资料,这里仅举两条以资对照。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一件《粤东全省商民直白》中有这么几句话:“咪利坚美士伯架,设立医馆,赠医送药,普济贫民,而中华士庶,无不赞美其德。”这是指的他当传教士医生时的事。而在前一年的《广东全省绅耆士庶军民人等声明》则说:“该国现有医生伯驾,向习外科医眼等症,并无别术声名,不识民情事势,不过在粤业医数年,稍晓广东土话数句而已。兹因该国公使不在,暂令其摄理印信,辄敢窃权持势,狐假虎威,随处生波,骚扰居民,始则骗租晓珠、下九、长乐各舖,继则图佔靖远、荳栏、联兴等街,又强租硬佔潘姓行宇。我等初犹以为彼建讲堂医馆公事起见,詎料假公济私,营谋己宅,至乖条背约,欺蒙陷良,贪得无厌,廉耻罔顾。今又骗租南关曾姓房屋,至今與情不协,街众弗容。伊乃胆敢砌词,混耸大宪,辄

称条挟制，诬告我父母官长，种种不堪，殊堪发指。”这两条都是当时绅民对伯驾的认识，此外中国官员对伯驾也另有评论，这里不烦具引。所有这些记述，我们都可以作为重建历史的文献使用，至于对所有文献的理解能力，我们与读者是处于同一个水平之上的。

外交官天然地代表着派出国的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晚清时期列强的外交官远不止是这一利益的代表，而是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特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过去在批评传教士的时候，往往用上“伪善”这个词，那无异于说，有些传教士表面上看来至少是善良的。但是外交官则不然，他们差不多连伪善的面目也不存在，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他们有许多是明火执仗登堂入室的强盗。但有点共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从个体上对他们进行研究。如果说传教士至少在客观上对中外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外交官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又是如何呢？即使我们在传记作者那里所看到的只是对传主的一味颂扬，但从他们对传主一生的叙述，我们依然可以明显看出“弱国无外交”的残酷现实。上面提到的英国驻华外交官巴夏礼可以说是一名典型的帝国主义分子，但他对中国的深刻了解，却使之将“强权即是公理”的手段运用得十分纯熟。事实上，晚清到中国的许多外交官对中国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有的甚至了解得极为深刻，这一点早在晚清就被认识到了。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里就说道：“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史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懵然无所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不需要多知道一些驻华外交官一生的经历以理解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吗？毫无疑问，传记作者的偏见以及对传主的喜爱或崇拜，必定会使他们在写作传记时有意无意地夸大或缩小，甚至掩盖某些事实真相。但上面已经提到，历史并不是只靠唯一的史料来塑造的，读者必定会搜寻相关史料来对传记内容进行批判性的阅读，以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

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在政治经济方面与中国发生直接关系的外交官，是不是有些在客观上对中外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如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此人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分子）就对外国人的汉语

学习贡献颇大,他编的汉语课本,他提倡的学习北京官话的做法,甚至对中国标准官话从南到北的转向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他设计的汉字罗马拼音系统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他本人后来则成了剑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又,英国驻宁波的第一任领事罗伯聃,也对中英语言接触有重要贡献,他将伊索寓言翻译成中文,并且将寓言的内容改成中国人易于接受的形式,又编纂有英语教科书《华英通用杂话》,成为后来中国人自己编写英语教科书的范本。再如英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翟理斯,编纂了一部卷帙浩繁的汉英词典,至今依然在语言接触史上有其参考价值,他又改进了威妥玛的拼音体系,使之更为完善。后来他继威妥玛成了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对在西洋传播中国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列强驻华外交官多数在晚清都起着形形色色的重要影响,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影响至今并没有完全理清楚。我们要理解晚清以来的全部历史,就不能不把所有与这段历史有关的人物都作一番彻底的清理。传教士是一部分人,外交官又是一部分,如果我们对这些人没有比较透彻的了解,我们又如何全面深刻地认识晚清的历史呢?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不管挨打的原因是不是落后,晚清的历史已经与世界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因此认识构建完整的晚清史,就少不了与中国发生密切关系的外来的各色人等。尤其在中国史学家尚未对来华各种人士作出深入研究时,作为重要参考读物的西方人士所撰写的外交官传记肯定是不可或缺的参考物。

附带要说明的是,还在中国与西方列强建交以前,在中国的港口就驻有一些领事,处理各有关国家与中国的商务往来。这与世界上的通行情况一致,即领事制度远早于外交活动。我们亦将这些领事列入外交官系列,事实上,有些领事后来也成了正式的外交官。而在中外正式建交以后,中国各地所有的领事馆自然从属于外交机构,领事也自然是外交官的组成部分了。

前言

人们对传教士的评价向来是褒贬不一的。有些人认为传教士是“世界上最高尚”事业的参与者^①，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是一群神圣而又无聊的绅士^②，充满了令人焦躁的虔诚。如果假定传教士无论作为一个整体或者个人，其所产生的影响经常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专业历史学家对 19 世纪众多英国、欧洲和美国传教士所进行的研究之少是令人吃惊的。这些传教士在亚洲、非洲以及太平洋诸岛上有过非凡的事业。因此，利用现在所能见到的大量资料中的一部分来撰写一部传记，将不无裨益。

本书所讲述的是 19 世纪一位沟通东方和西方的先驱，一位狂热的宗教扩张主义者，一位大胆的、具有天赋和丰富临床经验的外科医生，一位我们的曾祖父们所熟知、但已几乎为我们所遗忘的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传教人物，他就是皮特·伯驾(Peter Parker)博士。

① 美部会：《美部会头十年年度报告汇编》(First Ten Annual Report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之 1820 年年度报告，318 页。——原注

② Sydney Smith, Edinburgh Revue, 14: 40—41, April 1809. ——原注



伯驾医生开展工作的时机以及他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医疗传教(medical missionary)这一新职业得到更多的认可和接受,这是任何其他地方的任何医生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在基督教会扩张最为成功的19世纪,这一新职业的产生对向外国传教的贡献最具意义。尽管伯驾不是最早开展医疗传教事业的传教士,但是他选的时机却是传教事业尤为重要的一个时期。作为医疗传教这一新职业的开创者,他没有在锡兰^①传教的约翰·斯卡德(John Scudder)医生早,或许也没有尚未被研究的一些天主教神父早^②,但是很清楚的是,伯驾是前往中国的首位新教医疗传教士,且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因为中国的教会医学、世俗诊所和医科学校大都起源于他的持久工作。与英属印度政府不同,满族人的政府自己没有发展出一套周密的医疗体系;因此,传教士的贡献在中国就不仅非常有用,而且非常有影响。

本研究的缘起有三个方面:一是我的家庭背景之大致情况;二是由于一个特别的机缘,作为一名年轻的教师,我在中国中部的雅礼联合中学(Yali Union Middle School)^③工作了两年;三是在雅礼中学工作期间,我目睹了菲利普斯·福斯特·格林尼(Phillips Foster Greene)医生的医疗传教工作,格林尼是长沙湘雅医院^④的医疗传教士。多年以后,我作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East Asian Studies)的特别成员(1959—1960),承担关于伯驾的研究工作。此期的研究工作因韦尔兹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许可与资助方得以进行。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和耶鲁大学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教授的鼓励,使我能够专注于本书的写作。

为伯驾作传面临着许多特殊的问题,涉及了19世纪的各种主题:如新英格

① 即今斯里兰卡。——译注(全书脚注除特殊说明,皆为译注)

② 将行医作为传教的手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仅就中国的外来宗教而言,无论是佛教、景教、伊斯兰教还是明末清初的天主教,都曾将域外医学传入中国。但就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而言,显然19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在这方面的作用最为突出,但似乎不能将其视为开创者。可参见马伯英,高晞,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统》,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

③ 雅礼中学由美国耶鲁大学民间团体雅礼协会于1906年创办。关于雅礼中学,参见 <http://www.yali.hn.cn/>。

④ 关于湘雅医院,参见 <http://www.xiangya.com.cn/>。

兰(New England),阿默斯特(Amherst)学院和耶鲁学院,澳门、广州、新加坡、香港,日本,华盛顿和伦敦;西医,中医,福音传教,传教会和医疗传教;美国、英国、法国和中国的外交。伯驾的经历纷繁复杂,而这正是其令人着迷之处,但这也造成了多重困难。我的处理原则是,尽量使其不言自明,以使那些熟悉美国却对中国陌生(或者相反)的人不至于被隐晦不清的历史弄得茫无头绪。

另一方面,在传教史领域写传记与凑成一部关于林肯、格莱斯顿(Gladstone)^①、俾斯麦(Bismarck)^②这些被反复研究的人物的书不同。关于这些人,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了,这就意味着他们的传记作者可以将大部分时间用于使阐述更加精细,然而关于19世纪传教士的题目,无论该传教士有多重要,或者他的一生多么令人感兴趣,都很少有二手资料可供参考。所以本书的作者不得不忙于收集分散的、被忽视的文献,编撰纪事年表,解读未标日期的文献,以及辨认令人生厌的手迹等诸如此类的烦琐工作。

在这些多种多样的功课中,我获得了许多聪慧人士的鼎力襄助。我的暑期研究助理们的帮助尤使我感到幸运,他们是:Vita Bite, Jane Cohen 和 Vivien Tsu,他们经常处理很多棘手的细节问题,贡献颇大。他们的参与得到了韦尔兹利学院、美国哲学学会(约翰逊与彭罗斯基金会)和卫生部的资助,对此我满怀感激。

很多学者在不同学术问题上提供了有见地的意见,其中我尤其要感谢如下这些人:台北的 Robert Irick, Kendall Whaling 博物馆的 Marion Brewington, 波士顿的罗瑟洛(Francis B. Lothrop),费城医学院历史文献部(Historical Collection)馆员 W. B. McDaniel, 米尔顿美中贸易博物馆创建人、馆长克罗斯比·福士(Crosby Forbes),德国专家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以及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的李约瑟。

凯瑟琳·凯德伯里(Catherine Cadbury)为我提供了一些关于伯驾医生的著

①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 英国政治家, 于 1868—1894 年间四度任英国首相。

② Bismarck, Otto von (1815—1898), 德国政治家, 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



作,其中有一种属于其丈夫威廉·W.凯德伯里(William W. Cadbury)的私藏,他是伯驾医生传教事业出色的继任人。苏珊娜·巴尼特(Suzanne W. Barnett)为我释读了许多关于林则徐在广东之政策和活动的中文资料。一些我以前的学生为我检阅了很多其他地方的馆藏资料,他们是:伦敦的 Nancy Baker Metcalf,华盛顿的 Harriet Bryan,香港的 June Dreyer,日本的 Dale Hellegers。在我咨询过的许多档案管理员中,如下这三位带领我游弋于繁多的馆藏文献之中,他们是美国联合教会(United Church Board)的 Mary Walker,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历史文献部馆员 Madeline Stanton;还有 Irene Fletcher,1964 年夏天我前往他刚组建不久的伦敦会档案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s)做研究,他对该馆的收藏资料了如指掌。

在很多问题上帮助过我的医生当中,我尤其要感谢的是:伦敦盖伊医院附属医学院(Gu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病理学系已故的 G. Payling Wright 教授和 G. A. K. Missen 博士;波士顿儿童医院的 Richard M. Robb,对本书中关于医学的一章他为我做了仔细的修改,也提供了很多建议;对于林呱(Lamqua)画作(画的是伯驾所治疗的一些病人)中所涉及的医学问题,Linda Pessar 运用其掌握的知识为我提供了解释。

两位友善而又严厉的评论家阅读和评论了几乎所有内容:韦尔兹利学院的 Paul Cohen 处理了极为冗长而粗糙的文稿,同时提出了大量敏锐的修改意见;威斯康星州大学的 John Cooper 对稍后一个较好的稿本做了同样的工作。我的妻子贝蒂·吉利克(Betty Gulick)在多方面提供了帮助,特别是在文章结构方面提供了一些具有专业水准的意见,以及为了使文稿臻于完善而进行了严厉的删改。

很多图书馆允许我翻检和摘引其所珍藏的文献资料,我对他们亦表示感谢:耶鲁大学图书馆(卫三畏致伯驾的书信);联合教会世界牧师理事会(United Church Board for World Ministries,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Houghton Library]美部会档案);国会图书馆手稿部(顾盛文献集);耶鲁医学图书馆(伯驾文献集, Peter Parker III);R. Forbes Perkins(罗伯特·福士[R. B. Forbes]船长 1840

年为其妻子写的日记);伦敦会(合信医生及其他人的书信);海德公园罗斯福图书馆(爱德华·德拉诺[Edward Delano]日记);伦敦伦巴第街麦迪逊有限公司(Matheson and Co. Limited)(剑桥大学图书馆之渣颠档案馆所藏的文献资料);以及伦敦英联邦关系部(印度政府档案中的各类资料)。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女儿苏珊·吉利克(Susan Gulick),她将我那些乱作一团的、常常是乱得吓人的手稿清清楚楚地打印了出来。

爱德华·V. 吉利克
于马萨诸塞的韦尔兹利

1972

目 录

第一章 受命前的曲折道路	001
第二章 初抵中国以及在新加坡的实践	022
第三章 广州医院	037
第四章 失败的日本之旅	058
第五章 医疗传教的制度化	067
第六章 鸦片贸易与战争的来临	075
第七章 返回美国、举行婚礼以及伦敦之行	088
第八章 为顾盛使团效力	104
第九章 医学传教会的分裂以及伯驾与美部会的决裂	114
第十章 西医入华以及在华开办西医教育的先驱	130
第十一章 代理公使	150
第十二章 担任驻华公使	163
第十三章 退休,对伯驾一生的评价	176
注释	190
伯驾作品目录	231
参考文献	235
附录:伯驾文献选译	250
译名对照表	315

受命前的曲折道路

伯

驾出身于一个久居新英格兰的家族。伯驾家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1635年从伦敦来美国定居的托马斯。¹ 伯驾的父亲叫内森·伯驾(Nathan Parker), 1764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市(Framingham)的家族农场, 于美国独立革命之前和期间的岁月在那里长大成人。1791年, 他娶了牛顿市的凯瑟琳·默多克(Catherine Murdock)为妻, 夫妻俩留在农场。他们生有六个孩子, 其中皮特·伯驾(Peter Parker)生于1804年6月18日, 排行老五。长女哈里特(Harriet, 1793—1861)嫁给了弗雷明汉的木匠比奇洛(Josiah Bigelow)。尽管她与最小的弟弟似乎并不很亲近, 但却见证了他一生的命运。其他两个男孩分别排行老二和老四, 名字都叫普雷斯顿(Preston), 已夭折。至于1799年出生的玛利亚(Maria), 我们仅知道她嫁给了绍斯伯勒(Southborough)的费依(Abijah Fay), 她弟弟在中国时她只收到过他的一封书信^①。

妹妹凯瑟琳(Catherine)比伯驾小两岁, 是整个家庭最温暖、最亲密的纽带,

① 从本书附录中所选译的文献看, 伯驾写给姐姐玛利亚的信不止一封。



这从伯驾对她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可以看得出来。由于长期受疾病的折磨，她还没活到35岁便去世了。然而，伯驾却比他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活得更长久，比他的哥哥多活了近一个世纪。

伯驾的童年似乎仅在由农场、学校和教堂所构成的三点一线中度过。伯驾成长于一个坚定信仰新英格兰加尔文教派的虔诚家庭中。尽管相对来说，他并没有受到家庭信仰的影响，但据他后来描述说，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上帝的仁慈”将他带到一个“庄严的驿站并使他陷入沉思”。对他而言，到那时为止这是第三次，也是最为严肃的一次宗教体验。他继续描述道：“当我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我环视四周，带着惊讶默默地呼喊：我在哪里？我是怎样来到这里的？我在此做什么？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已经做过了些什么？”沉思立刻使他进入了一种罪恶的感觉中，但很快又恢复了。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罪恶感又反复产生了几次，而且越发强烈，也越来越频繁，使他有时呼喊道：“啊，我从来没有降生！”他决心不再犯任何罪过，为此他努力不违反任何上帝的戒律，但屡遭挫折；同时，他也发现，他艰难的决心是一个不堪忍受的负担。有一天，他和他父亲在田里劳作，他失望地大哭起来，大声喊道：“我应该如何做才能获得拯救？”^②

他母亲引导他将基督作为他依靠的救世主，并让他阅读《新约·罗马书》第八章第一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①。他于其中发现了莫大的安慰，并且原来的失落感消失了，转而获得了喜悦与被宽恕感。在新英格兰的大部分乡村，从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时代直到19世纪，在这样的宗教皈依方式中所产生的信仰是很典型的，通常被认为是“进入宗教生活的普遍形式”^③。

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他几乎没受到什么正规的学校教育。那时的弗雷明汉在几个分散区域的校舍中，为孩子们提供基本的中级技术训练。在拥有了这样的经历并完成了他在专科学校中的学业后，他开始从事两种工作：夏天务

^① 凡本书引用《圣经》之处，译文均参照和合本《新旧约全书》，香港《圣经》公会，1984。

农,冬天教书。他15岁那年开始在赫立斯顿(Holliston)的一家“普通学校”任教。16岁那年先后任教于韦斯特伯勒(Westborough)和格拉夫顿(Grafton);在返回韦斯特伯勒教了一段时间的书后,他于1821年和1822年在他们家族农场附近塞伦恩德路(Salem End Road)的一间学校继续教书,同时也在弗雷明汉东部有过几次教书经历。⁴

很可能是这些教学经历使年轻的伯驾想要接受大学教育的愿望更加强烈了。然而他却不敢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只能将此心愿深深隐藏,直到有一次他向邻居朋友坦普尔(W. P. Temple)谈及了这一愿望,从而引起的连锁反应一直影响到七千英里之外。⁵当伯驾克服了他父亲的反对后,他的牧师凯洛格(David Kellogg)博士鼓励了他上大学的想法,并推荐他到16英里外伦瑟姆(Wrentham)的戴伊(Day's)学院念预科。

1826年3月,伯驾进入戴伊学院。8月因父亲病重返回,回家后不久他父亲病故了。尽管重新回到伦瑟姆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他还是回去了,在那里读了一个学期后,转入了弗雷明汉学院。在弗雷明汉学院注册读书也意味着他又可以在弗雷明汉东部教书了。他获得了一笔学费助学金,并免费在许多家庭(包括他自己家)吃饭。1826—1827年在伦瑟姆和弗雷明汉完成的预科学习足以使他被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接受。他于1827年秋天进入阿默斯特学院,一所“先知们的低廉学校”。⁶

19世纪20年代的阿默斯特学院可没有现在这么风光。⁷学生总数接近200人,教师不足一打,勤奋但不出名,其中多数是牧师,坚定的三位一体信奉者。那时学院最大的特色,是她的崭新程度、与世隔绝与宗教虔诚,以及近期的一次反对与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合并的运动。

阿默斯特学院考试成绩采取20分制。伯驾的数学和拉丁文为及格,希腊文良好,自然史为优秀,而最好的科目是修辞学。大二第一学期,他修辞学考了18分。⁸该学年期末,他已对该校图书馆藏书之少感到不满,并且提及“非常令人不快的”文学社团的氛围,但未作解释。⁹

在这里读书期间,伯驾受到了一个朋友的一次不经意的启迪。此人名叫豪